

引用格式: 揣松森. 贾谊《新书》文献学价值探微[J]. 南都学坛, 2025, 45(4): 75-82.

贾谊《新书》文献学价值探微

揣松森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诸子研究中心, 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 贾谊为西汉时期著名诸子, 其著述主要见存于《新书》。《新书》是贾谊著作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重编所形成的集子, 其面貌的差异反映了作品存亡聚散状况和编纂者文学观念之间的双重纠葛。书中大量征引先秦经传杂说以及诸子百家之语, 保存了众多汉代以前的佚文遗说, 具有重要的校勘和辑佚价值。更为重要的是, 其中“事势”“连语”“杂事”三类篇目汇于一编, 使人得以窥见周秦西汉子家学术交修和体用兼该的浑融面貌, 从而更深切地认识诸子身份和子学性质, 并辩证地看待“文”与“献”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新书》; 文献学; 子书重编本; 校勘与辑佚; 子学性质

中图分类号: I209; C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25)04-0075-08

DOI: 10.16700/j.cnki.cn41-1157/c.2025.04.005

贾谊(前200—前168)为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其著述主要见存于《新书》。传本《新书》是贾谊著作经过多次重编后所形成的面貌, 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结构体例亦有特别之处, 整体上呈现出多方面的文献学价值。首先, 经过考察贾谊著作流传史以及《新书》版本定型过程, 可以凸显早期子书重编本问题的重要性。其次, 书中广泛征引先秦经传之文以及诸子百家之语, 保存了大量汉代以前的佚文遗说, 极具校勘和辑佚价值。最后, 《新书》篇目分作“事势”“连语”“杂事”三大类, 其性质与来源都有所不同, 由此可进一步重审诸子身份和子学性质, 从而建立一种更为融通的“文献”观念。兹分别论之于后, 望方家指正。

子略儒家“《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五曹官制》五篇”^①, 诗赋略屈原之属“《贾谊赋》七篇”, 以及《汉书·儒林传》所云“《左氏传训故》”。这些著作包括文、赋两大类, 前者是经子论著, 后者是诗赋之作。隋唐时期, 贾谊著作见录于子部和集部, 如《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有“《贾子》十卷, 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九卷”, 《新唐书·艺文志》题“贾谊新书”, 均缺“录一卷”), 集部载梁代有“《贾谊集》四卷, 录一卷, 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 均无“录一卷”)。至于《宋史·艺文志》, 则仅录儒家“《贾谊新书》十卷”, 不载其文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载:“《汉志》五十八篇, 今书首载《过秦论》, 末为《吊湘赋》, 余皆录《汉书》语, 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1]由此推测, 《贾谊集》在宋代可能已经散佚, 其遗篇附于贾谊子书当中。

关于贾谊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诸

收稿日期: 2025-03-18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诸子原论: 起源、特质及其价值”(项目编号: 2023BWX013)。

作者简介: 揣松森(1986—), 男, 河南省南阳市人, 博士后, 讲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诸子学研究。

^① 班固注曰:“汉制, 似贾谊所条。”

现存贾谊著作集的最早版本——明成化十九年(1483)洛阳乔缙所刻《贾长沙集》10卷,就是将赋疏附于子书的面貌。该书卷首题“贾长沙集”,次行作“贾谊新书”;目录卷3无《解县》篇名,卷4《礼容语上》、卷5《问孝》有题名,然三篇皆缺文;又卷7《君道》、卷8《道德说》、卷9《修政语下》、卷10《小传》篇名脱去,正文实不缺;目录后有《洛阳贾生传》1篇,乃将《史记》《汉书》本传及贾谊奏疏辞赋櫟括成文。该本虽题作“贾长沙集”,其主体则是《贾谊新书》^①。刘明指出:“乔缙之后,贾谊集的编本沿着两种路径发展:一种是将《新书》视为贾谊‘文’的范畴,与贾谊赋疏类作品合编,等同于作品集的观念;另一种则是脱离《新书》的束缚,回归集部范畴内贾谊集的本色,仅以赋疏类作品作为对象。”^[2]属于前者的,如明代有朱节编印《西汉三子至文》本、何孟春编次《贾太傅新书》、张运泰等合编《汉魏名文乘》本;清代有王耕心著《贾子次诂》以及当代的上海图书馆编《贾谊集》、王洲明等合撰《贾谊集校注》等。属于后者的,如明代有陈深评点《诸子品节》本、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代有严可均《全汉文》本之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汉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贾谊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的离散聚合所致。

文学观念的影响,不仅表现为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将诗赋与经传、诸子进行分别著录,而且体现在南朝时期出现了《贾谊集》的编选——作品的思想性与文艺性逐渐分途,注重形式美感和陶冶性灵的纯文学观念日趋流行。但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仍有相当强韧的生命力,由此形成了影响至于近代的文学观念之争。大体而言,其持纯文学观念者倾向于将贾谊奏疏辞赋等独立于《新书》之外,子集之辨相对较严;而持杂文学观念者则于子集文赋兼收并蓄,尤其是贾谊著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佚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将其生平

资料也归拢一编,以便研究贾谊的一家之学。

考贾谊著作流传史,知其在隋唐以前至少经过三次编订。

其一,结集72篇本。案《崇文总目》载:“《贾子》九卷,汉贾谊撰。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3]又《隋书·经籍志》云:“《贾子》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②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称“传本七十二篇,臣向删定为五十八篇(《崇文总目》)”,“此说必得于《别录》”^[4]。盖古有此说,而其结集远在刘向以前。至于其编者,一般根据周秦时期古书通例推断乃出他人纂集。清卢文弨认为,“《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5],由此推测《新书》出自其门徒^③。此外,徐复观以为成于厥孙贾嘉或曾孙贾捐之^[6]¹⁰⁷,吴松庚主张编纂者乃其子贾璠^[7]。虽皆推测之词,然征诸文献亦颇有迹可循,而其成书时间当不迟于西汉景、武之世。

其二,刘向编定《贾谊》58篇本。案《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55引)皆云刘向删定72篇为58篇,其说当有所本。又《汉书·艺文志》载《贾谊》58篇,不云有所出入,则《七略》亦原有《贾谊》58篇无疑。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渐不可久”句《集解》引刘向《别录》曰“因以自谕,自恨也”,又《汉书·贾谊传》赞引用“刘向称”云云,都类似《别录》之语,则《贾谊》58篇系经刘向编定,殆可断言。

其三,南朝所编《贾谊新书》本。“贾谊新书”之称,清人汪中、孙诒让认为是刘向校书时所加。然《汉书·艺文志》出于《七略》,不应是班固删去原书题中“新书”二字而无标注。况且,刘向所校子籍多为旧书新编本,为何不皆题作“新书”?考“贾谊新书”之称初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德行》始引之,庾仲容《子

^①案《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明刻本一部,行款与此悉同,然无序跋及校刻人名氏。王重民认为:“观其大题‘贾长沙集’四字,皆是剜改补刻,疑原与他书合刻,或原在某丛刻中,其后板片散亡,仅存是书,遂改原来总题为‘贾长沙集’,因印为此本耳。”察其行款与字体,王先生的推测不无道理。

^②此观点出自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五引。

^③刘咸忻《旧书别录》同意此说:“卢氏谓门人所集是也……要之,是书为贾子门人录其师著,分段立篇,班氏撮要而连属之,但依班所撮,更移今本篇目可也,字异班者不可尽改,班所无者不当删,是即《贾子》原本也。”

抄》著录“《贾谊新书》八卷”^①,而彼三人皆南朝齐梁间人;若“新书”命于刘向,何以越数百年始见其名,而此前一概称作“贾谊”和“贾谊书”?考《隋书·经籍志》所载贾谊著作情况,可知南朝齐梁间曾整理其书。而且南朝梁代多子部典籍重编新本,如晁错《晁氏新书》、姚信《士纬新书》《姚氏新书》,皆可例此。盖刘向以人命书曰“贾谊”,南朝时重为编次,故称“贾谊新书”^②。汪中、孙诒让之说,所据主要是刘向《书录》,但今传《书录》并非原貌,不可全然为据。如今传《荀子书录》称“《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其与《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不云卷数者相左,而合于《隋书·经籍志》“《孙卿子》十二卷”之数,最为明证。

“新书”之称,孙诒让谓:“此书隋、唐本当题‘贾子新书’(隋、唐志著录称‘贾子’者,省文),盖‘新书’本非贾书之专名,宋、元以后,诸子旧题删易殆尽,惟《贾子》尚存此二字,读者不审,遂以‘新书’专属之《贾子》,校槧者又去《贾子》而但称‘新书’,展转讹省,忘其本始,殆不可为典要。”^[8]孙诒让认为“新书”乃宋元以后讹省所致,隋唐本当题作“贾子新书”,故省称“贾子”。考《郡斋读书志》《玉海》等都已直接题“新书”,则其讹不迟于南宋。然《贾子》本是否同于《贾谊新书》本,抑或是刘向所编残本或隋唐再编新本,颇不易断言。但从后世流传情况来看,二者大约分属两个系统,其篇卷不尽相同^{[9]20-22}。要之,其书宋代版本可考者甚夥^③,篇目互有异同,虽出现聚合性版本,但《贾子》《新书》两大版本系统之分际犹然可见。至于今本《新书》,其篇目虽不尽同于唐宋旧貌,然所见佚文为数有限,其文本内容应与唐宋之本大体相当。古书流传既久,不免残缺散佚,往往经后人搜罗辑佚并重为编次,故不可以其零碎难粹而率然以伪作视之^{[9]9-12}。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传本《新书》是贾谊著作

经过多次重编后的面貌,乃其书离散存亡状况与后世编纂者文学观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所呈现的文献学价值,不仅反映了图书部类特别是子部和集部的纠葛关系,而且促使人们沿波讨源地回到“文”的悠久传统中观照先秦两汉的言说和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子部典籍重编本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为探究秦汉乃至先秦子书的成书机制提供了典型的参照样板。

二

唐代皮日休曾评论道:“余尝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10]贾谊志在经世,其述道言治一切以经制为主,有大本大经之政,有应对时势之策,往往兼杂众说而不主一家,故思想成分显得较为复杂^④。贾谊思想的复杂性在著作中的体现,就是作品中广泛征引了先秦经传杂说之文以及诸子百家之言。在这些征引材料中,大量内容互见于其他传世文献,还有不少属于汉代以前的佚文遗说,由此不仅可以窥测贾谊的学术谱系和思想渊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校勘功能和辑佚价值。

贾谊受先秦六艺传统熏染甚深,观《新书·道德说》所云“《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11]302},由此可见一斑。征诸现有文献,《新书》所用经传杂说甚夥:

(1)引《诗》十有余条^⑤,多为《雅》《颂》之篇,颇有说义,盖得春秋以来《诗》教传统;又用古典说《诗》,其中以用《晏子春秋》《左传》《国语》《缁衣》《孟子》等居多^⑥。

(2)用《书》4条、《逸周书》5条,杂论古礼及政教问题,可见其经制思想渊源有自。

(3)称述《礼》经、传记尤多。其述古礼者,如:

①案:唐马总《意林》作“八卷”,宋高似孙《子略》引作“九卷”。

②潘铭基对此有论述,详参《贾谊及其〈新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3-114页。

③如晁公武所见本、淳熙八年程漕使刻本、陈振孙所见本、淳祐八年长沙刻本、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刻本、王应麟所见本等。

④关于贾谊的思想特点,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纵横家说以及儒法融合说、儒法道融合说、儒道名融合说等不同看法,详情可参方勇主编《子藏·儒家部·新书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版,《前言》第23-24页。

⑤为行文简约起见,本文仅举总略条数,其具体条目可参揣松森《〈子藏〉书目提要三种——〈新语〉〈新书〉与〈春秋繁露〉》,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6-144页。

⑥潘铭基亦有详细论述,见《贾谊及其〈新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209页。

《数宁》:礼,祖有功,宗有德。^{[11]30}

《审微》: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11]74}

《阶级》: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罪;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11]80}

《礼》: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11]214}

礼,国有饥人,人主不殍;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报囚之日人主不举乐。岁凶谷不登,台扉不涂,榭彻干侯,马不食谷,驰道不除,食减膳,飨祭有阙。^{[11]216}

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11]216}

此外,多引古礼杂记,如《忧民》《无蓄》《礼》3篇所引《王制》,《保傅》篇所引《学礼》《明堂之位》,《胎教》篇所引《青史氏之记》,都构成贾谊礼学思想的来源^①。至于《保傅》篇所讲教养太子之道,《容经》篇所述曲礼仪容,《礼》篇“故道德仁义”章所论礼义,《礼容语·下》篇所辑有关礼容之言,《胎教》篇所说胎教之义,《立后义》篇所记立太子之礼,都是有赖《新书》才得以保存的古礼精义和礼论文献,故后世礼家多所采录。

(4)引《易》3条,化用2条;又《容经》篇解说《乾卦》初九、上九爻义,而归于论人主明是审非、察中居宜之仪容。可见贾谊之征引非专为释经,或作断章取义之解。

(5)贾谊传《春秋左氏传》,史有明文记载,则无怪乎《新书》于《左传》《国语》多所征引和用典。这些条目大抵用其故事立说,至于史实细节或别有所据,或如所谓“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12],故鲜有说其经义者。

总之,贾谊兼通诸经而尤精《礼》学,用经则时有说义,然亦不无断章取义者。所引经传杂说皆古礼、政术、治道等事关国之大体者,实其经制思想之所取资。此外,他还广泛吸收先哲时贤等诸子百家学说。这里暂且不论贾谊师事吴公及其与司马季主交往等事,仅考其见于著述者如下。

(1)接受荀学及法家思想。俞士镇认为,贾谊长于《诗》《礼》《春秋》和名法之学,均源自荀学的影响^[13]。考《新书》多处文字与《荀子》词旨相近,殆是从之因袭而来。受荀子影响最大的,便是劝学、君道及援法入礼的思想。其书与《韩非子》亦存在诸多互见之处,皆有关礼法名分、强干弱枝和虚而应物的法家之术。此外,《藩强》篇云“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1]39-40},《制不定》篇言“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11]71},强调权势法制之用,也无异于法家学说。

(2)吸收道家思想。贾谊作品中存在大量引用或互见《老子》《文子》《庄子》《鹖冠子》等道家著作的篇章,受到其中万物生化和祸福流转观念影响。而所受影响最深者,莫如《道术》《六术》《道德说》中的道德性命之说。这里“道”近于虚位,“德”才是生成万有的源头。这些学说的黄老色彩十分显著,同时也构成法家思想的形而上基础。

(3)濡染儒家思想。贾谊著作多引《论语》《缁衣》《孟子》《荀子》《孔子家语》等儒家文献,所述大抵为孔子及七十子后学的言语行事,受到他们的仁政、礼义、教育、五行等思想影响。围绕经制问题,贾谊提出诸多技术性的举措,其中颇多有涉于权势法术者,然其根本追求和最高理想则是以礼治国,仍归宗于儒家仁义之说。他批评秦代政治严酷,揭示其短祚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1]3}。

(4)效法《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思想。案《新书》征引三书,采其有关礼乐、政治等内容。徐复观认为:“作为他的诸子百家的绾带的,当是《管子》。因《管子》一书,本由汇集折中儒道法三家思想以为其骨干,更广罗战国时期许多角度不同的思想,以形成一部‘政治丛书’的性质。”^{[6]111}其实,《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有同样的性质——书主皆位至国相,一切以经制为主,故其著述莫不兼采众家而又各有归宿。

(5)广泛征引黄帝、鬻熊、史佚、由余、发子、墨子、陆贾之言,以及出入百家传记的古谚俗语。

^①可参工藤卓司《〈贾谊新书〉的礼学来源——〈容经·容〉与先秦礼说之比较》,《历史文献研究》第43辑,广陵书社2019年版,第68-80页;《〈贾谊新书〉中的仪礼——〈容经·经〉与先秦礼说之比较》,何志华等编《古籍新论:先秦两汉文献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75-594页。

其中,所引鬻熊之语值得注意。它们集中在《新书·大政》《修政语》诸篇,颇旁见于《逸周书》《文子》《慎子》等书,而与《鬻子》互见文字尤多^[14]。而且,《大政》篇各章每每以“闻之于政也”发语,则这里所谓“政”殆如《鬻子》篇题中“传政”“汤政”“禹政”“周政”之类,当是西汉时期所流传的古书。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周政》6篇,班固云“周时法度政教”,也许就是与之类似的著作。据现有佚文内容来看,其中主要宣扬仁爱、仁义、民本、宽刑、躬道、选贤、福善祸淫、言行枢机等政治思想。此书虽不传于世,但对贾谊乃至汉代政治思想产生过极深的影响,殆无疑也。

综上所述,贾谊对前代思想资源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的思想体系。融合性特点虽是战国以后思想发展的趋势,却与诸子兼具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身份不无关系。清王耕心称“贾子之学由诚以入明,其于邪正治乱之辨审矣。惟其操本运末,乃足师范百世,学者苟能心知其意,庶几深契政教之原”^[15],对此犹有洞见。而通过考察《新书》中的不同文本类型,则不难窥见早期诸子学术交修和体用兼该的浑融面貌,当知王耕心之言洵非妄许谬赞。

三

贾谊思想成分复杂、来源多端,加之其著作经过多次重编,造成《新书》中包含不同的文本类型。阴法鲁等人将现存篇目分作五类,包括奏疏、政治理论、哲学思想、别人记录整理的贾谊言论、贾谊搜集或讲述的历史文献^[16]。除了政治理论、哲学思想是从内容方面作判别外,其他三条都是着眼于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类型。这些类型在《新书》版本上有明确标识,即“事势”“连语”“杂事”三种文类的区分。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贾)谊著《事势》《连语》《杂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汉书》,谊之著述未尝散轶,然与班固所载时时不同。固既云‘掇其切于世者’,容有润益刊削,无足怪也。”^[17]这是现存最早的相关记录。据王应麟《玉海》卷55所载篇目,其第1至4卷为“事势”,第5至7卷为“连语”,第6至10卷为“杂事”^[18]。明何孟春称“事势旧四卷……连语、杂事旧各三

卷”^{[19]155、159},与王应麟所见者相同,盖宋本《新书》旧貌如此。然包括何孟春本在内的明刊本,其“事势”类大致同于旧本,而“连语”“杂事”二类篇目则颇相出入。这或与当时对三者内涵和文类性质的认识模糊有关。例如,何孟春“尝谓事势、连语、杂事之云,特其五十八篇中之三篇名耳。如事势之云,盖《治安》一疏首有‘事势’,其疏尽名于是篇矣。后人因其书散轶而幸掇其仅存者,无复伦次,篇析而章裂之,以求足所谓五十八篇之数,遂以事势概及《过秦》,继乃创为《宗首》《数宁》等名”^{[19]156-157},又说“连语、杂事旧各三卷,特以标目强相分异。所谓连语乃是杂事,杂事中间乃连语也……虽然,谊书连语、杂事之云,吾不能得其实矣”^{[19]159-160}。他指出“事势”类出自贾谊奏疏之文,颇有见地;但认为“事势”“连语”“杂事”本系三个篇名,传本《新书》某些篇目乃从之割裂而来,则与事实不符。尤其是他对“连语”“杂事”名义的解释,显得言辞游移、含混不清,那么他据此所作的篇目归类就很难说是确凿无疑的。

到了近代,这些问题引起格外重视,相关讨论也日益深入。刘咸炘以《过秦》至《瑰玮》32篇为“事势”,言“除《过秦》外皆陈政事,依班所掇而更定之,事势二字盖取疏首语”^{[20]406};以《傅职》至《修政语下》17篇为“连语”,谓“此皆述古礼及空论义理,编书以事势为主,故曰连语,盖不能分正附,不能称外篇,故为是区别之词”^{[20]407};以《礼容语上》至《立后义》4篇为“杂事”,称“《礼容语》宜附《容经》,《胎教》《立后义》宜与《保傅》诸篇类别,此盖倒在后而人妄加题也”^{[20]409}。他对“事势”“连语”“杂事”诸篇内容的概括颇有可取之处,但认为“连语”近于“事势”的附编,而“杂事”又为“连语”的补充,似尚未达一间。相较而言,余嘉锡所论更为精审,其《四库提要辩证》卷10云:

吾谓《过秦论》亦贾生所上之书,且为以后诸篇之纲领,何以言之?《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凡属于事势者,皆为文帝陈政事,不应首篇独异。……至于《连语》诸篇,则不尽以告人君,盖有与门人讲学之语,故《先醒篇》云“怀王问于贾君”,而《劝学篇》首冠以“谓门人学者”五字。其《杂事》诸

篇则平日所称述诵说者。凡此,皆不必贾子手著,诸子之例,固如此也。^[21]

据此,“事势”“连语”“杂事”为三种文体类别,其文本生成方式并不相同。“事势”类收录的是上呈皇帝的奏疏,出于贾谊手著。对于这一类,不管是篇卷归类、主旨把握还是文本生成方式,人们的看法大体相同。而分歧所在主要集中于对“连语”“杂事”两类的认识上。杨延平认为,“连语”为连缀主旨相同的语体故事,“杂事”为聚集门类相同的语体故事,二者均由篇旨论说和说体故事两部分组成,只是“杂事”的范围较“连语”更广^[22]。他将“语”“事”都理解为“故事”,实际上并不准确。案《说文解字》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23],可知“语”为辩难之义。就今存语类文本而言,其内容多载古圣先哲的嘉言懿行,是以记言为主而兼杂记事的,并非都是故事。结合《新书》“连语”诸篇内容来看,余嘉锡认为其中包括上说人君和下教门人之语,是非常准确的。至于“事”字,本义为职事、从事,引申为事情、事物,如《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皆是这个意思,也不专指故事。古书中多有以“杂”来作篇和章分组的例子,前者如《庄子》“杂篇”,后者如《新序·杂事》。石光瑛《新序校释》称:

云杂事者,不专属于一类之事。本书标题,若《刺客》《节士》《义勇》《善谋》,事类繁重,可别为一篇。余则博采传记,人非一时,事非一类,大要以悟主安国,因事内诲为归,故名杂事。^[24]

石光瑛认为“杂事”指各种事类,远较杨氏解作故事更为准确。这是作为章之分组的“杂事”,而《新书》“杂事”作为篇的分组,其性质更近于《庄子》“杂篇”。对于“杂篇”问题,张秦铭分析道:

被划分到“杂”类者,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并非作者手著,更多是对其他古书材料的摘录和门人后学的编撰;二是这部分内容很多来源于材料的拼凑,因此,结构往往也较为松散;三是相对于该书的核心内容来说,是作为补充材料或诠释性质的。^[25]

这与余嘉锡认为《新书》“杂事”属于贾谊平日所称述者,所见略同。严格地讲,这部分内容只是贾谊师徒所传习的典籍资料,并非他们的著作;这从

《新书》“杂事”类的《大政》互见《鬻子》,《礼容语》互见《国语》,以及末篇《传》节略于《汉书·贾谊传》——都出自其他文献,可得确切证明。与之不同,“连语”类则不管是出于贾谊手著,还是其弟子编撰,大体都是贾谊言语行事的记录,犹可以其著作视之。关于《新书》“连语”“杂事”的生成方式,夏德靠归纳为了四种。他认为:

与《事势》完全出自贾谊本人撰写不同,《连语》《杂事》的生成方式是多样化的,大体有四种方式:一是贾谊亲自撰写;二是就某一具体篇目而言,一部分源自编纂,一部分可能是贾谊撰写的;三是贾谊纯粹采用编纂的方式完成的;四是出自门人的编纂。^[26]

夏德靠突出了“事势”与“连语”“杂事”的不同,但对于“连语”“杂事”二者则混言未分。事实上,他总结的四种文献生成方式中,前两种属于“连语”,后两种则归于“杂事”。总而言之,《新书》58篇被分为“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其文本内容和性质是有显著不同的。这种现象在早期子书中非常典型,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其一,“事势”类乃贾谊所著奏疏,“连语”类为贾谊及其门人所集上说下教的文辞,“杂事”类是贾谊与门徒所习文本的汇编及其传记节录。其中,既有贾谊针对现实问题而行权立事的策谋之篇,又有他在寻常生活中上下交接而入道见志的日用文章,还有其素所称述的先代典籍和作为附录的生平资料。由此所构成的《新书》这部典籍,基本上就是以贾谊生平和学术为中心的文献集成。对此,余嘉锡论之曰:

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授,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九流之说,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三语见《汉志·艺文略》),“不能相通,皆有所长,时有所短”(见《庄子·天下》篇)。则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亦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非其文不美也,以其为微言大义之所托,言之有物,不徒藻绘其字句而已。^[27]

无疑道出了早期诸子文辞的荦荦大端,及以汉代

为转捩点的著作体例的古今之变。盖古之君子,终日乾乾,修道畜德,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道德文章,合而为一,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对于周、秦、西汉的诸子文辞,大都当作如是观。

其二,由上所论诸子著作的成书体例,又可见周、秦、西汉诸子学术实以述道言治为其中枢,思想上兼收并蓄,整体呈现出学术交修和体用兼该的浑融面貌。考诸子学虽发端于西周礼崩乐坏以后,然深受周代政教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关注现实、尊道重德和长于辩说的思想品格。换言之,诸子学以“为治立言”为特质,实与诸子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密不可分。“诸子”之“子”,其内涵历经宗法、爵称、百家众技、子书等历史变迁,“诸子”一词也从指代某种身份的人演变成由其技艺或言辞生成的一定体式之书。要之,诸子其人入道见志,有其学必有其术,然后发为言辞,或施于政事,或行之日用,嘉言懿行必多可采,笔载而纂辑之,便成一家之书。而这一家之书,正如明代李宾所说,乃是“方物感而情生,情生而言发……率露本真,物不相假,言虽殊体,道由一揆,言征乎人,人符其言,是文以人传,非人以文传”^[28]。也就是说,“诸子”之成立在根本上系于其人——有学有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诸内而形诸外,道德文章足为世法。

其三,在汉代学术史上,贾谊本是以传《春秋左氏传》名家的,然其著作中却包蕴着丰富的礼学精义以及逸礼和道法之类的经典文本。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足以引发多重思考。从学术方面来讲,诸子有应对时势之策,又有大本大经之政,因此对于他们立说的体用本末都应有所体

察——不仅要观其言行并察其所以然,而且要能体会其言外之意与不言之言,断不可仅仅拘执于诸子书中的文辞字句之迹。从文献学方面来说,诸子文辞结集成书是一家之学的结晶,其中的内容往往是非常复杂甚至是充满张力的,但它们能够汇集在一起又绝非偶然,必有某种现实缘由或连结点。这就涉及更深一层的文献学问题。

刘勰有一句经典的话——“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29],此语精辟地指出了“圣”“道”“文”之间的关系。在诸子学视域下,三者就转换为诸子之人、学、书的关系。进一步说,这就是“文”与“献”的辩证关系问题。“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①。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能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30]朱熹亦云:“文,典籍也。献,贤也。”^{[31]63}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文”指包括典籍在内的礼法典章制度,“献”指贤才也。“文”“献”相须为用,而斟酌损益则在圣贤折中,故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1]275},孔子叹“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1]29}。总之,圣贤是礼法实践的典范,其言行举止就是相应礼仪法度的现实呈现和完美诠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逸周书》专讲“官人”,而《荀子》特重“儒效”。圣贤之于典制多是如此,故少皞氏官制因郯子而传^②,《士丧礼》由孺悲从孔子求学而得以书^③。至此再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贾谊《新书》的文本和编定,更可见是——人因书为学而书得人乃传,则“文”与“献”的辩证互动关系可谓彰明昭著、引人遐思。

[参 考 文 献]

-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0.
- [2]刘明.贾谊集的文献史[J].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4):59-69.
- [3]王尧臣,等.崇文总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8.
- [4]姚振宗,邓骏捷.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M].澳门:

- 澳门大学出版社,2007:40.
- [5]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141.
-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7]吴松庚.关于《新书》的整理者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释义两个问题的考辨[J].船山学刊,2007(4):90-93.
- [8]孙诒让.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260.

①原文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②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礼记·杂记下》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 [9] 揣松森. 前言[M]//方勇. 子藏·儒家部·新书卷.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
- [10] 皮日休. 皮子文藪[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7.
- [11] 阎振益,钟夏. 新书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2]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66.
- [13] 俞士镇. 贾谊学术出于荀卿考[J]. 师资月刊,1939(4):45-48.
- [14] 潘铭基.《鬻子》与贾谊《新书》互文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2):25-30.
- [15] 王耕心. 贾子次诂[M]. 龙树精舍刻本,1903:叙录.
- [16] 阴法鲁,陈铁民. 贾谊思想初探[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5):3-14.
- [17] 孙猛. 郡斋读书志校证: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24.
- [18] 王应麟. 玉海[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1038.
- [19] 贾谊. 贾谊集:贾太傅新书[M]. 何孟春,订注. 长沙:岳麓书社,2010.
- [20] 黄曙. 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1]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65-467.
- [22] 杨延平. 贾谊《新书》之“连语”“杂事”新解[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3(11):66-73.
- [23]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98:51.
- [24] 石光瑛. 新序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1:3.
- [25] 张秦铭. 刘向校书之“杂”类研究[J]. 理论界,2023(8):67-74.
- [26] 夏德靠. 论贾谊《新书》的生成、编纂及流传[J]. 中华文化论坛,2019(2):68-81.
- [27]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1.
- [28] 李宾. 新鐫八代文钞百家小集[M]//故宫珍本丛刊:第610册.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3.
- [29] 刘勰. 文心雕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
- [30] 皇侃. 论语义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3:59.
- [3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ploring the Philological Value of Jia Yi's *Xinshu* (新书)

CHUAI Songsen

(Henan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ers,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Jia Yi, a renowned thinke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eft behind a body of work primarily preserved in the *Xinshu* (新书). This text is a compilation formed through multiple stages of re-editing during its transmission, and its varying forms reflect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the survival and loss of Jia Yi's writings and the evolving literary perspectives of successive compilers. *Xinshu* extensively cites pre-Qin classics, miscellaneous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various philosophical schools, preserving numerous fragments and lost writings from before the Han dynasty. As such, it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textual coll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lost litera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sections—*Shi Shi* (事势), *Lian Yu* (连语), and *Za Shi* (杂事)—into a single collection offers a rare glimpse into the integrative nature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during the Zhou, Qin, and Western Han periods. This allow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scholarship, and encourage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n* (textual expression) and *xian* (documentary evidence).

Key words: *Xinshu* (新书); philology; recompil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textual collation and recovery;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责任编辑:李法惠]